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元曲 折口蘊

刘大钧/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元典拾蕴

刘大钧/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典哲蕴 / 刘大钧主编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2

ISBN 7—5325—3619—X

I . 元… II . 刘… III . ①哲学 - 中国 - 文集 IV . B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5002 号

元典哲蕴

刘大钧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在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5 插页 3 字数 408,000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

ISBN 7—5325—3619—X

B · 417 定价：5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64063949

砥研群奥 焕往炳来

——海峡两岸易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

论文集·中国哲学卷序

2002年8月18日—22日，在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海滨城市青岛召开的“海峡两岸易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汇集了两岸及海外易学界、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批专家学者。会议盛况空前，讨论热烈，收获颇丰。本卷所收入的，就是经过精选的与会专家学者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的部分论文。

综观5天紧张而热烈的讨论和提交论文的情况，本次大会在中国哲学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数端：

其一，关于“中国解释学”与“经典诠释学”

西方具有悠久的诠释传统，并且早即确立起诠释学这一专门之学。近年来，随着西方诠释学的引进和对其研究的日益深入，以之为借镜研究中国传统经学与哲学，成为学界的一大热点。进而，在揭示中国同样具有悠久的诠释传统，尤其是儒家经学的诠释传统的基础之上，以汤一介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人，鲜明提出建立与西方解释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的、以研究中国对经典问题解释的理论为内容的“中国解释学”的主张。本次会议上，汤先生进一步重申了建立这种“中国解释学”之体系与方法的强烈愿望，引起与会学者的共鸣。有的学者进而提出并探讨了“经

典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认为,当今中国经典诠释学研究的突显,必将促进中国哲学研究既有范式的深度反省与新的范式的孕育和重构,进而刷新人们对哲学观念、哲学主题、哲学方法的理解与运用。上述这些见解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它们对于进一步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推进“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理性探讨,深化中国哲学本身的研究,必将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二,经学研究

中国具有特色鲜明且源远流长的经典诠释实践和诠释历史。这首要地体现为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和诠释历史。而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和诠释历史所汇成的,就是新意迭现、与时偕行、永葆活力、精彩纷呈的经学史长河。站在哲学的高度,以人文历史理性的视野,对在这一经学史长河中所出现的一切,作出系统的梳理与省思,无疑仍是当今学界所宜致力的一大重要课题。结合出土简帛佚籍与传世文献对经学作出深度探讨,是当今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有的学者即以传世文献作参照,分析了上博简《诗说》的编联与结构,提出了自己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春秋公羊学说曾是两汉盛极一时的今文经学的中坚,对其进行深入探究,无疑将加深对汉代经学学术理念、天人关怀的理解。有的学者就分析了春秋公羊学说体系形成的过程及其基本特征,认为自战国迄汉末,渐次成为汉代经学中的一大显学的春秋公羊学说,其“公羊义法”的源头是《春秋公羊传》,董仲舒对其续有阐发,何休则作了相当完备的总结;这一学说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性、变易性与解释性。宋代的朱熹是理学的巨擘,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儒学发展史、经学演变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于有“前有孔夫子,后有朱文公”之说。从经学演变史的角度,深入探究朱熹学术的所然与所以然,自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有的学者即探寻了朱熹经学产生的思想渊源,指出,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唐宋的四书之学与义理之学,北宋以来的理学,汉唐的训诂之学,是朱熹经学的主要思想渊源。朱熹正是在吸取、借鉴这些思想资源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创造性地推出他的经学思想的。《五经正义》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其有关史事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有的学者就五经正义学案问题开展研究,并向大会提交了有关成果。

其三,儒家哲学研究

儒家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主干,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思想的主流。真切把握中国哲学的学脉神髓与古老中华民族的本体精神,成功回应世界范围内的新的挑战而重建中国哲学与中华民族之精神,即必须加强儒家哲学、儒家思想的研究。本次会议上,透过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一则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瑰丽的儒家哲学、儒家思想画卷及其重要的现代价值与未来意义,再则让我们更加清醒看到了儒家哲学、儒家思想所面临的现代处境与严峻挑战。就先秦原始儒学言之,有的学者揭示了孔子的述、作之义与文化的继承性问题,指出,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现了一种整体文化视野下的文化关怀,兼顾了文化的继承性与创新性;有的学者辨析了“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认为此论与孔子的政治追求不相契合;有的学者具体考辨了子思与孟子的关系,认为孟子虽深受子思及其门人思想之影响,并与之构成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派别——思孟学派,但他并未受业于子思或其门人,《子思子》、《孔丛子》所记载的那位姓孟名轲字子车的儒者,并非孟子,而是一位与孟子同姓名的子思弟子;有的学者从孟子“仁民爱物”说的角度切入,考察了儒家的生态观,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生态伦理观,它重视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同情之心对待动物和一切生命,以尽人类之职责,从道德情感与道德理

性出发,关心他人与自然万物,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生态伦理关系,至今仍有重大启迪意义;有的学者分析了荀子“群”的理念与国家理论,指出,从中可以发现荀子对封建世袭制度的全面反对,但他所论述的个人,不是站在水平境地审视的,而是以垂直性角度来定位的“臣民”。有的学者辨析了自孔子以来儒家所大力提倡的中庸理念所包蕴的不同层面的丰富内涵,认为这一理念可作哲学的诠释与伦理学的诠释。在哲学的视域中,又有本体论的与方法论的不同诠释;在伦理学的视域中,又有道德层面与伦理层面的不同诠释。有的学者通过分析儒家道德的生存基础,认为,儒家道德能生存至今,主要得益于先秦儒家对道德内容的合理设计、汉代儒家对道德功能的科学定位及汉后儒家对道德寄生场域的全面拓展。就宋代以后的理学言之,有的学者从北宋张载关学的角度切入,考察了宋明理学的原型及其真精神,指出,张载关学所透出的是学政不二的帝王之道,欲复三代的超唐史观,以礼立教的现实关怀,这一切,即表现了宋明理学之原型及其真精神,也正是中国哲学之所以能够在新世纪生生不息、焕发青春的根本所在。就明清之际的启蒙实学思潮言之,有的学者以戴震为解读对象,剖析了 18 世纪中国义理之学的确立与建构,认为这种建构遵循了由训诂而推求义理,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原则。就以返本开新为突出特征的现代新儒学言之,有的学者从后现代的视域,重新审视了现代新儒学,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必须集中全人类各民族的智慧资源以解决“地球村”所面对的共同问题的时代要求;它反对相对主义,力图为“无根无向”的现代人确立一个既可以安身立命、又可以利用厚生的价值资源。就儒学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言之,有的学者论述了儒家思想传统在近现代所遇到的五个主要挑战,即科学、民主、女性主义、环境主义以及自身如何生存下去;断言能否有效

回应这些挑战,也许是 21 世纪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问题。

其四,儒家哲学研究

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中以其高度的哲学性和独特的人生关切,同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哲学即形成了儒道互补的基本发展格局。在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过程中,研究儒家哲学、儒家思想的同时,自然不可忽视对道家哲学、道家思想的研究。本次会议上,有的学者通过对道家开山老子的道与西方神哲学的比较,认为由老子的道可以推论出宇宙间应有一最高的精神实有存在,它是永远、唯一、无限、不变、最高的生命体,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保存、辅助、眷顾者。有的学者著论认为,老子无为而治的治道,当源于历史记忆中的上古“垂拱之治”。有的学者考察了全球化历史新境遇下的老子思想的价值,认为老子强调顺万物之自然,对于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平衡,仍有积极作用。有的学者分析了继老子之后正统道家的另一代表庄子的本体论哲学,认为“蔽于天而不知人”,实为侧重于“天”的庄子对于绝对真理的一种往而不返的追求。有的学者从总体上诠释了道家哲学智慧的如下三个基本特点,即超越性、玄思性、否定性。有的学者着力探讨了道家的超越智慧,指出,这种智慧具体体现为对礼乐文化异化的超越,对物役、物累的超越,对有为政治的超越。有的学者研究了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对老子哲学的理解,使我们可以从外国哲人的眼中进一步了解老子哲学的价值。有的学者着眼于现代道家研究的现况,提出了道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道家地位问题,新道家、新道学问题,道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问题,道学的普及与大众化问题,道学史研究问题,郭店楚简与儒道关系问题。有的学者则立足于现代与未来,提出新道学文化有如下八大支柱:人行道哲

学,政治管理学,文艺审美学,医药养生学,宗教伦理学,自然生态学,丹道性命学以及方技术数学。以上的研究与分析,既较为深入地展示了道家哲学、道家思想的魅力,又初步勾画出了其未来图景。

其五,墨家哲学研究

墨家思想曾是足以与儒家思想相抗衡的春秋末、战国时期的显学,对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发挥过应有的作用。墨学的研究价值不可低估。本次会议上,有的学者即分析了墨家的进步政治观及其哲学基础,认为尚贤、尚同是墨子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革新的核心内容,是针对当时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提出的,目的是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良之士参与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今天,借鉴墨学的意义,绝不逊于借鉴儒学的意义。

其六,佛教哲学研究

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其后即开始了其与中国文化原有成份冲撞、交融的历史,最终诞生了中国化的大乘佛学的各个派别,充分显示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巨大融摄力!佛教的传入,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哲学、文化发展格局。因此,研究中国哲学,也必须深入研究佛教哲学。本次会议上,有的学者即剖析了中国化的佛教典范禅宗,指出禅宗中人因深受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陶冶、孕育,他们证心是证中国心,尤其和庄子的心遥遥相印,他们也在这个婆娑世界中作逍遥之游,把庄子的真心变为自性,把庄子的真人变为无位真人,把庄子的“是非两忘而化其道”改为“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把庄子的“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改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有的学者则专论了唯识的认识哲学,认为唯识哲学体系博大精深,绝非唯心论、唯物论、经验论、现象学等可类比

而推之。有的学者则立足于中国文化发展长河的宏大背景,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指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与融合的复杂关系中;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这些识见,无疑加深了我们对中国佛教哲学与中国文化的认识。

其七,其他

此外,本次会议上,有的学者还论述了中国文化名人中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清初反清志士屈大均、清代著名诗人吴渔山与澳门的关系;有的学者探讨了辛亥革命后,满清皇家贵族复辟集团与尊孔的关系,皆富新意,一新人们的视野。

总之,在本次会议上,学者们立足于中国哲学的不同领域,或阐今论远,错综其贞,或缘饰儒雅,乃发嘉教,大家各陈含秀垂颖之见,将会议的讨论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鄙人仅就此次会议所交论文及大会发言、分组讨论所闻,略作小结如上,聊作本论文集之序。

刘大钧

2002年9月1日

目 录

砥研群奥 焕往炳来 刘大钧 (1)

·中国哲学与诠释学·

经典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 魏长宝 (1)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儒家传统面临的五个挑战 李晨阳 (13)

后现代视域中的现代新儒学 李翔海 (25)

“全球化”与老子思想的当今价值 李锦全 (45)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内在性承启的省思 赵玲玲 (56)

·经学研究·

试析上博简《诗说》的编联与结构 江林昌 (63)

春秋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 陈其泰 (84)

朱熹经学产生的思想渊源 蔡方鹿 (100)

·诸子前哲学研究·

金文所见周代思想意识中的“命” 连劭名 (115)

·儒家思想研究·

- 道德的中庸与伦理的中庸 田文军 (128)
 论儒家道德的生存基础
 ——基于道德与历史的分析 罗明星 (141)
 孔子“述作”之义与文化的继承性 李景林 (157)
 “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辨 裴传永 (169)
 子思弟子孟轲非孟子说 郭沂 (182)
 从孟子的“仁民爱物说”看儒家的生态观 蒙培元 (203)
 荀子的群与国家理论再考 佐藤贡悦 (225)
 学政不二，礼教为本
 ——从张载关学独特的致思路向看宋明理学之原型
 及其真精神 陈俊民 (237)
 十八世纪义理之学的确立与建构
 ——以戴震思想为例 王杰 (249)

·道家思想研究·

- 道家哲学智慧的基本特点 丁原明 (263)
 道家超越智慧再发现 李明珠 (277)
 道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邵汉明 (285)
 新道学文化的八大支柱 胡孚琛 (292)
 老子的道与西方神哲学比较 张振东 (330)
 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老子哲学诠释及其影响 赖贤宗 (343)
 老子治道历史来源的一个探寻
 ——以“垂拱之治”与“无为而治”的关联为中心
 王中江 (368)
 庄子哲学中的本体论思想 张京华 (389)

论列御寇 陈绍燕 (402)

·佛教研究·

生命的心心相印

- 庄子、禅宗与中国生命转化的哲学 吴 怡 (412)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洪修平 (444)
唯识的认识哲学

——从《八识规矩颂》有关八识关系切入 ... 熊 瓣 (469)

·墨家思想研究·

论墨家进步的社会政治观及其哲学基础 朱传棨 (492)

·其 他·

中国文化名人与澳门

- 汤显祖、吴渔山、屈大均合论 李宗桂 (510)
社会转折关头的正统心态

——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与尊孔关系探讨
..... 张艳国 (533)

经典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

魏长宝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近年来,随着西方诠释学在中国传播和研究的日益深入,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一度被学界遗忘的中国传统经学重新回到当代学术研究的理论视野中,许多学者开始把中西两种不同背景和不同特点的诠释传统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比较,有的学者尝试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源远流长的经典诠释实践和诠释历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理性的反思,还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体系和诠释学方法的设想。可以说,“经典诠释学”研究目前正在形成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新方向。

“经典诠释学”研究的兴起,尽管吸引了来自学界的各个方面兴趣和关注,但“经典诠释学”这一提法本身则仍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诠释。时下汉语哲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大致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向度:一是对西方诠释学的介绍和研究,以洪汉鼎先生(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对西方诠释学原典的译释和诠释学理论的研究为代表;二是着眼于中西诠释传统的比较,充分吸收

中西哲学各派的理论资源,创立富有个性特色的现代诠释理论,以成中英先生(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倡导的“本体诠释学”为代表;三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诠释资源尤其是儒家经学传统和经典诠释实践,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体系和诠释学方法,以汤一介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和黄俊杰先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孟学诠释史研究为代表。

“经典诠释学”研究显然与上述第三向度的研究进路更为接近。因为经典诠释学的建构虽说离不开对西方诠释学理论的了解和吸纳,离不开对中西诠释传统的分析和比较,但是,它更多地是对本土的经典诠释资源的现代诠释,是对传统经学的诠释实践和诠释经验的梳理、分析、归纳和转换。所以,我们认为,把这种理论研究称为“经典诠释学”是比较恰当的。这里的“经典”,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古代的典籍,尤其是儒家的《四书》、《五经》、《十三经》等经籍,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时间概念,即与“现代”相对应的“古典”。汤先生把他所构想的“与西方解释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的以研究中国对经典问题解释的理论”^①称为“中国解释学(诠释学)”。这与我们所谓“经典诠释学”从研究的内容和理论的进路来说并无实质性的差异。但是,细究起来,“中国诠释学”与“经典诠释学”这两个概念还是应当有所区别的。从构词上说,“中国诠释学”是一个与“西方诠释学”相对应的概念,而“经典诠释学”(全称应当叫做“中国经典诠释学”)则与“一般诠释学”(指相对于经典诠释之外的其他诠释活动,如历史诠释、文学诠释等)或“现代诠释学”等概念相对应。前者是一种植根传统资源的“现代”诠释理论,具有更多的现代理论体系的色彩;而后者则致力于用现代诠释学方法,研究传统思想中的经典诠释问题,更多地面对传统的问题意识。二

者的理论基点并不相同。可见，“中国诠释学”比“经典诠释学”理论包容性更为广泛，而“经典诠释学”研究则是建构“中国诠释学”的艰难理论进阶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汤一介先生的最终目的虽然是要建立一门“中国诠释学”，但汤先生（以及黄俊杰先生）目前所做的工作称作“经典诠释学”研究也许更合适一些。

“中国诠释学”的研究和建构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没有扎实的、有份量的“经典诠释学”研究成果做基础，建构“中国诠释学”的美好设想就不过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典诠释学”研究的进展情况及其理论效果。所以汤一介先生说，对于历史上的经典诠释实践的梳理和分析，对建立“中国解释学”或许会“有若干意义”，或许根本就“无甚意义”^②。不过，汤先生认为，我们的观点没有必要太过消极，也就是说，汤先生实际上对最终建立一门“中国诠释学”是充满信心的。与“中国诠释学”的扑朔迷离的前景和难以确定的命运相比，“经典诠释学”研究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则要明朗得多。尽管中国历史上只有悠长的经典诠释传统和丰富的经典诠释经验，而没有系统的“经典诠释学”，但是，今天的学者依托于当代学术研究的背景，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典诠释的历史和实践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有效的清理，则“经典诠释学”的成立和建构就是水到渠成之事。所以，“经典诠释学”研究面对的难题主要不是“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经典诠释学”研究的路径选择和建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当代理论境遇相互关联。“经典诠释学”研究面对的文本资源和诠释经验虽然都是中国的，但其问题意识和叙事模式则是西方的，中国哲学中的“经典诠释”问题只是在西方诠释学的刺激

和比照之下才被激活起来,突显出来,因此,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必然要融入西方诠释学的语境,遭遇西方诠释学的挑战,并受到西方诠释学的诱惑。汤一介先生认为,“真正的‘中国解释学理论’应是在充分了解西方解释学,并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历史上注释经典的问题作系统的研究,又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丰富的注释经典的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之后,发现与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有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也许才有可能成为一门有中国特点的解释学理论。”^③对于“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和建构来说,问题也是同样的。

综观时下正悄然成风的有关“经典诠释学”研究的诸多理论成果,确有一些学者能以在西方哲学方面的严格的训练和坚实的素养,以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和特质的深入体悟和把握为基础,对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诠释问题做出发人深省的思考和富有洞见的探索,但就学界的整体境况而言,不少研究者在知识结构、理论视野和思路方法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局限和欠缺,致使当前关于“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和讨论仍存在一些不足,乃至出现某种偏失。其中有两种倾向特别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种倾向是不能自觉地了解和充分地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局限于从传统经学和经学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诠释历史和诠释实践。经学和经学史研究当然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前辈学者如皮锡瑞、刘师培、蒙文通、马宗霍、蒋伯潜、周予同以及日本学者本田成之等人,曾在经学史研究方面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复杂的机缘,近半个世纪以来,经学研究被打入冷宫,长期受到学界的忽略和漠视,以至于今天的学人甚至包括许多人文学者普遍对经学这门学问表现得相当陌生和隔膜。经学是传统学术的主体,不懂经学,所谓弘扬传统文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当代学者有义务和责任把